



CHINA-UNITED STATES
EXCHANGE FOUNDATION
中美交流基金會

CCIEE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中美经贸关系： 现状与前景

会议总结报告

2019年7月9-10日

愉景湾酒店

愉景湾

香港



中美交流基金会

香港上环干诺道西 3 号亿利商业大厦 20 楼

热线：(852) 2523 2083

传真：(852) 2523 6116

Email: info@cusef.org.hk

网址：www.cusef.org.hk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中国北京西城区永定门内大街 5 号

热线：(8610) 8336 2165

传真：(8610) 8336 2165

Email: ef@cciee.org.cn

网址：english.cciee.org.cn

中美经贸关系 现状与前景

会议总结报告
2019年7月

目录

报告概要	2
会议背景	5
开幕式	
• 欢迎辞	6
• 主题演讲	7
议题一：中美经贸关系	
分组议题一：经贸关系现状	
• 主题演讲	10
• 小组讨论	13
分组议题二：投资环境与技术创新	
• 主题演讲	16
• 小组讨论	19
分组议题三：宏观政策	
• 主题演讲	23
• 小组讨论	25
分组议题四：得克萨斯州和美国中部地区代表谈“合作”	
• 主题演讲	29
• 小组讨论	31
议题二：美中关系：现在与未来	
• 主题演讲	35
• 小组讨论	39
议题三：全球化、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前景	
• 主题演讲	44
• 小组讨论	48
附件：	
附件 1. 会议日程	51
附件 2. 大会电子相册	

请登入 www.chinausfocus.com/2019forum 下载附件



报告概要

为重启搭桥

在 G20 峰会后，为了助推重启中美关系，中美交流基金会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于 2019 年 7 月 9 - 10 日在香港联合举办了“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论坛。来自美国、中国和其他亚太地区国家的 40 多位重要的今昔利益相关者和影响者汇聚一堂，直面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挑战，探求找寻共识的创造性新方法。

中美交流基金会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深信，建设性对话和多样化交流对促进世界最发达国家与人口最多、发展最快国家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我们的讨论不仅提供帮助，提供灵感，而且要激励大家采取更多行动，来支持极为重要的中美关系”，中美交流基金会创会主席董建华在开幕辞中说，“希望这次会议结束的时候，我们能对未来更有信心。”

现状与前景

本着汇集中美关系有影响力声音的传统，中美关系基金会邀请到众多嘉宾来到香港参加论坛的专题讨论，和作主旨发言。各位尊敬的发言者代表着中美关系中不同的利益攸关方，他们包括：

- **来自国际社会的：**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 (Jean Chretien)；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 (Yasuo Fukuda)；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 (Goh Chok Tong)
- **来自美国的：**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艾德温·福尔纳 (Edwin Feulner)；前白宫幕僚长、纽约梅隆银行副主席威廉·戴利 (William Daley)；耶鲁大学杰克逊国际事务中心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 (Stephen Roach)；前国会参议员马克·柯克 (Mark Kirk)；美国商会中国中心主任及大中华区副主任王杰 (Jeremie Waterman)；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白莉娟 (Jan Berris)；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主任杜克雷 (Clayton Dube)；上海纽约大学首任副校长杰弗里·雷蒙 (Jeffery Lehman)；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方大为 (David Firestein)；美国中部地区美中协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鲍勃·霍顿 (Bob Holden)；得克萨斯州商业联盟首席执行官杰夫·莫斯利 (Jeff Moseley)；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议员吉米·弗兰尼根 (Jimmy Flannigan)；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商业项目和企业事务主任罗宾·古德曼 (Robbin Goodman)；大奥斯汀亚洲商会首席执行官玛丽娜·巴加瓦 (Marina

Bhargava) ; Core Engineering 项目工程师**威尔·尼科斯 (Will Nichols)** ; 拉雷多商会董事**安德鲁·卡兰科 (Andrew Carranco)** ; M&A国际创始人**徐莉 (Li Xu)** ;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创始人及董事会主席**尼尔·布什 (Neil Bush)** ; 前美国参謀长联席会议副主席、Red Bison咨询集团执行主席**威廉·欧文斯 (William Owens)** ; 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美国-亚洲安全倡议项目主任**艾江山 (Karl Eikenberry)** ; 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奥克森伯格-勒伦学者**大卫·兰普顿 (David Lampton)** ;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前院长、国际政治学教授**瓦利·纳斯尔 (Vali Nasr)** ; 前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 (Max Baucus)**

- **来自中国的:** 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 原商务部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 中国前驻美大使**周文重**; 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会长**马秀红**; 原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理事长**田力普**;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昌林**;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曹德荣**;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傅向升**;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兼贸易协调部主任**许海东**; 正泰集团董事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南存辉**; 中国电子商会会长**王宁**;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戚振宏**;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名誉院长**杨洁勉**;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 华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傅育宁**;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 英特尔副总裁**杨彬**; 戴尔科技集团全球副总裁**周兵**; 高通公司全球副总裁**郭涛**
- **来自中国香港的:** 冯氏集团主席**冯国经**; 恒隆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启宗**; 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刘遵义**; 弘毅投资创始人兼总裁**赵令欢**

与会者是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商界领袖及知名学者，他们就自由贸易、关税和多边主义在当世界的价值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分析。未能前来出席会议的一些人还提供了预录的发言，比如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国际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 (Chas Freeman)**，以及 C. V. Starr 董事长兼 CEO、美国国际集团前董事长兼 CEO **莫里斯·格林伯格 (Maurice Greenberg)**。

这些与会者利用丰富的集体经验参加了一系列小组讨论，评估如何解决贸易战引发的经济关系紧张。在以“经贸关系现状”、“全球化、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前景”、“投资环境与技术革新”、“德克萨斯州和美国中部地区代表谈‘合作’”为主题的小组讨论中，大家探讨了两国如何从贸易关系中获益、美国和中国最具互补性的经济领域、美中两国的微观层面如何在艰难时期保持关系，以及其他影响现行关税政策的政治议题。

发言者强调，不能忽视中国和美国当前的国内政治气候。他们同时指出，白宫领导人的变动不会自动使中美关系回到 2016 年的状态。许多小组讨论者认为，承认永久的变化，是实行新的富有成效政策的先决条件。他们还一致认为，中美两国竞争的大环境已经发生改变，经济、技术、

地理和安全考量对两国看待彼此的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力量的平衡转向竞争对立，一些人担心，那些把谈判对手视为敌人而非朋友的人，将日渐成为政策的推动者。

作为解决中美紧张态势的关键方法，发言者强调在经济领域之外寻找跨国议题的重要性，因为在这方面两国可以合作。这类议题可以在外交领域，也可以在私营领域，比如核扩散和气候变化。发言者还强调了贸易战中“成功”的不同定义，指出解决这一问题是达成协议的关键。

论坛其他重要成果包括：

- 中国和美国已经发现自己处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它是无法靠领导层的更迭来缓和的。两国在制定政策时必须承认并考虑这一新环境。
- 地缘政治现实、技术创新和安全考量大大改变了各国看待彼此的方式，使它们从合作伙伴变为竞争对手。
- 通过确定影响中美两国的跨国议题，双方能够找到合作的领域。

以“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论坛为例的这类对话，对于弥合中美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是必要的，尤其在这个充满争执的时期。保持这类对话可以确保未来中美关系的加强，而不是恶化。正如董建华先生强调的，“中美脱钩有百害而无一利”。G20 结束后，工商界、学术界和政府的领袖们迅速聚集在一起，探讨中美两国的未来，正是展现了这种信念的活力与力量。

论坛结束后，我们在同与会者和发言者的交流中得到令人鼓舞的积极反馈：

- 时常举办这类论坛不仅增添动力，而且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在就经济和贸易问题交换意见时，必须坦诚面对中美两国国内政治的影响。。
- 令人鼓舞的是，大多数与会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持乐观态度，相信合作将是保持两国关系的关键。
- 正如论坛中许多讨论所强调的，重要的是要记住，中国和美国应当把双方的讨论与合作扩大到贸易领域之外。
- 论坛成功的一部分原因，是它为日本、加拿大和新加坡等“第三方声音”提供了平台。或许应当有一个论坛来关注“附带伤害”，即当美国和中国要求其他国家站队时，会给无辜的旁观者带来什么影响。

这些反馈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将继续推动持续的对话和积极的互动。中美交流基金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及董建华先生对所有参加和支持本次论坛的人士深表感谢，并期待着我们今后的合作。

会议背景

这是一次高级别国际会议。会议汇集来自不同国家的政治家、前政府首脑、高级外交官、商界领袖和知名学者，共同探讨中美关系的现状与前景。

目的

本次论坛恰逢中美建交 40 周年。在刚刚结束的 G20 峰会上，中美两国领导人于 2019 年 6 月 29 日达成继续谈判的共识。

本次高级别的非政府间交流之目的是寻找应对当前挑战、推动未来合作与稳定的方法，以促进中美关系。

论坛汇集国际社会的智慧与力量，让大家就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和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问题表达看法。

主题

本次论坛是一次自由开放的对话，讨论重点包括经贸关系、知识产权、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开放市场和全球治理，以及美中关系的前景与发展。



开幕式

欢迎词

董建华 (Tung Chee-hwa)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美交流基金会创办人、主席

今天很高兴欢迎各位来到香港这个漂亮的愉景湾，讨论有重大全球意义的话题。希望优美的环境能给各位带来更多灵感。

6月29日，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G20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晤。是时候聚一聚了。人们也许认为，峰会刚过，还太早。但这正是关键，我们正是要讨论这次峰会的影响和对我们大家的重要性。

很高兴今明两天我们有机会深入探讨许多重要问题。希望我们的讨论不仅对各位有帮助，而且能激励大家采取更多行动，来支持极为重要的中美关系。

最后，希望这次会议结束的时候，我们能对未来更积极，更有信心。我对各位前来参加这次会议深表感谢，你们中的一些人是不远万里而来。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中的每一位。



主题演讲



福田康夫 (Yasuo Fukuda)

日本前首相

福田康夫在讲话中表示，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与日本曾经面临的问题类似。最近美国谈判代表对中国的措辞，让他想起他们当年对日本的态度。

他讲述了日本政治领导人和决策者如何因误判和管理不善，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破裂使日本出现十多年的严重衰退。

根据福田康夫的说法，日本与美国进行过艰苦谈判，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很多重要的教训。他说，日本经历的所有困难，都证明是日本产业与社会走向现代化与国际化的“阵痛”。

他承认，美国的要求不一定公正。但除非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否则全球都将继续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

福田康夫就当前形势向中国提出几点建议：

- 中国走的每一步不仅影响中美关系未来，也影响整个世界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发挥何种作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
-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两大强国之一，必须与其他主要国家共享全球化愿景，展示世界强国应有的责任感。
- 中国不应将自己看成与美国贸易摩擦的受害者。相反，中国应把这一困难阶段视为让国家变得更好的重大机遇。这种锲而不舍的努力将为未来铺平道路，使中国找到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引擎。
- 中国作为大国，应当正视与其他国家合作所面临的挑战。中国应该迈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第一步。这条道路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全世界。



艾德温·福尔纳 (Edwin Feulner)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艾德温·福尔纳认为，无论2020年总统和国会选举结果如何，“等特朗普下台，这样事情就能恢复‘正常’”都不是可行的策略。无论谁赢得下届总统选举，在经济政策方面，中美关系都不会回到特朗普之前的状况。他建议中国不要期望美国政策回到“过去正常的美好时光”。

他指出，挑战是切实存在的，但中美经济关系重建和升级的机会也是存在的。通过明确而坦诚地说清楚这些挑战，两国可以确定问题所在，更充分地了解彼此的分歧，甚至可以解决其中的一些分歧。

在他看来，两位领导人在大阪的微笑握手不能保证最终达成协议，因为从美国角度说，有三个基本问题尚未解决：

- 第一个障碍是知识产权。在这个问题上双方观点有根本的不同，各成一体且相互对立。无论窃取知识产权案件、强制技术转让或网络安全担忧有哪些具体细节，尊重专利与知识产权这个首要问题必须坦诚公开地予以讨论。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只靠微笑、动听的声明，或改革“在即”的承诺。
-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在WTO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以及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接受世界银行巨额贷款。如果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美国就有理由设想中国会像第二大经济体那样行事，而不是试图玩弄世界体系。
- 第三个主要挑战是中国在改变谈判的基本规则。

福尔纳在总结时表示，至少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无论谁前谁后，美国和中国仍将是两大主要经济体。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将不得不学习如何面对美国仍是当今主导力量这一现实。两国必须继续进行对话，在会晤时采取积极行动，并切实执行那些维系两国关系的协议。



曾培炎 (Zeng Peiyan)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国务院原副总理

曾培炎理事长的发言围绕美国声称的对华贸易“吃亏论”。他从三个方面系统性分析了为何“吃亏论”站不住脚：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形成的客观必然性、全面客观看待美对华贸易逆差数字、美国在对华经贸中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他认为，对于贸易逆差问题，美国不能只片面强调货物贸易逆差，要全面看待贸易逆差产生

的原因以及得失，采取政策措施要建立在客观分析基础上，一味加征关税只会适得其反。希望中美双方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贸易协议。这不仅对两国经贸关系具有历史意义，对国际经贸合作也有示范意义。

曾培炎演讲的要点包括：

- 美国贸易逆差由来已久，这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低储蓄、高消费形成的内部失衡，以及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即追求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向海外转移制造业等密切相关。同时，美国多年来限制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是对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政策原因。
- 全面客观看待美对华贸易逆差数字：
 - 不能仅看货物贸易，还要看服务贸易。在双边贸易中，尽管美国对华货物贸易为逆差，但服务贸易是顺差；
 - 美对华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对整个东亚地区的贸易逆差。中国对美货物出口中，半数以上是加工贸易，中间品主要来自东亚地区。经济全球化分工条件下，贸易增加值才能反映一国真实的贸易水平；
 - 计算中美贸易额应该用 GNP（国民生产总值）方法，将两国企业在对方国家的经营收入也计算进来，而非采用已经落后的基于 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贸易统计方法。
- 美国在对华经贸往来中没有吃亏，而是在国家、企业、家庭等各部门获得了实实在在利益：
 - 美国借助美元优势地位获得大量国际铸币税；
 - 中美贸易为美国消费者提供大量物美价廉商品；
 - 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获得丰厚回报；
 - 中国为美国提供大量低价美元资本，中国多年来的贸易盈余主要通过美国国债回流美国。

议题一 中美经贸关系

分组议题一 经贸关系现状



威廉·戴利 (William Daley)

纽约梅隆银行副主席

威廉·戴利表示，中美关系需要的是一种把事情做成的勇气、动力和激情。双方必须以合作、积极的方式把事情做成。

即使承认世界现在处于临界点，戴利还是指出，很多人过于关注中美关系如何充满了挑战。但他认为，中美两国这些年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两国有能力并且会通过经济手段解决问题，情况最终会好转。他相信，中美两国过去 25 到 30 年间的共同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好了。

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是完美的。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样的协议并不完美。这个体系运作了 25 年，肯定有需要改变的地方。他补充说，WTO 也是如此，它可以更好、更快、更公正地运作，看上去更加公平。WTO 必须为 21 世纪而实现现代化，重新发挥作用。

展望未来，戴利指出，对所有相信中美关系有好处的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让中国、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普通人开始看到这些好处。他认为，这是当前中美关系困难的核心所在。



张晓强 (Zhang Xiaoqiang)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执行局主任

张晓强在发言中回顾了中美贸易摩擦的要点，并指出双方进行了多轮谈判，屡经波折，每次波折都源于美方的违背共识，不讲诚信。今年 3 月至 4 月底，两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一致，针对遗留问题，中方提出，双方要互谅互让，共同寻找解决分歧的办法。但美方采取了霸凌主义和

极限施压手段，坚持不合理的高要价，坚持不取消经贸摩擦以来加征的全部关税，坚持在协议中写入涉及中国主权事务的强制性要求，导致双方无法弥合剩余分歧。

他还用翔实的数据说明中美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贸易摩擦损人害己。自6月17日至6月2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就对华加征关税举行了7天听证会，参加听证会的314名美国企业代表，有303位反对加征关税，苹果公司、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等一批企业要求美国政府豁免关税。

他指出，美国某些政客看到的是世界其他国家在经贸方面都在占美国的便宜，大搞贸易保护主义，结果，2018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达8900亿美元，比上年扩大840亿美元，制造了历史最高纪录。美方挑起贸易争端将严重干扰全球产业链，损害市场信心，给全球经济带来严峻挑战。

张晓强阐述了关于美方“不合理高要价”的三点中方立场：

- 多进口美国商品是中方基本态度，但最终实现是企业间的市场采购行为，取决于有市场需求、价格合理；
- 中国企业需求巨大的是美国高技术产品。但恰恰在这方面，美方不仅严格限制对华出口而且不断加大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管制力度；
- 不论中国企业一年从美国多进口多少亿美元，必须要有中方市场的增量需求和美方的供应能力。

张晓强通过对中国进口美国大豆、客机、原油与LNG等三大类主要产品的翔实数据分析，指出这三大类到2020年中国市场的增量需求合计约790亿美元。中国即使要实现到2020年比2018年（2018年中国自美国进口共1344亿美元）多进口2000亿美元的美国货物，都已经是很大的增长幅度，需要两国企业及政府机构做出很大努力才可能实现。而美方在5月初突然提出中国政府要承诺增加3000亿至3300亿美元进口，这明显是不合理的高要价。

自2018年3月美方单方面发起经贸摩擦以来，中国愿意采取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推动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双方应该向对各自经济发展都有积极促进作用的公平协议的方向努力，美方单赢的协议永远都不会有，双方能达成的必须是一个双赢的协议。美方只要一个“好的协议”，但中方同样也只要“好的协议”。



斯蒂芬·罗奇 (Stephen Roach)

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中心高级研究员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高级讲师

斯蒂芬·罗奇认为，有关中国的辩论被大量的错误叙事污染了，无论宏观层面还是结构层面，都是受政治诿过游戏的驱使，最终目的是把美国人不愿解决或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推到别人头上。

罗奇指出，宏观经济学的的一个基本要点，就是投资必须永远等于储蓄。你不储蓄，又想有经济增长，那就只好从国外引入剩余储蓄，同时保持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来吸引外国资本。

由于经常账户赤字，美国与许多国家存在贸易逆差，2018年共有102个，甚至包括梵蒂冈。这是一个多边贸易问题。如果美国不解决储蓄问题，而是关闭与中国的贸易，中国人会简单地把贸易转移到其他对美国保持顺差的国家，这意味着通过成本更高的生产者向美国公众收税。

罗奇说，除了美国总统和国会错误的宏观叙事，美国对中国新的进攻性政策也存在错误的结构性叙事，这体现在182页的《对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进行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对中国行为、政策和做法进行301调查的结果》报告当中。

作为学者，罗奇对这篇报告中的证据进行了详细研究，并得出结论：报告列出的一系列估计作为证据不够充分，不会被美国法院接受。尽管如此，这份报告已经成为总统对华关税政策的依据。

罗奇警告说，这样的政策完全忽视了关税在20世纪30年代所起的破坏性作用，当时的关税战将一场相当严重的衰退转变为美国的大萧条。

在批评美国的同时，罗奇也给中国提出建议：不要分心。如果中国冒险在关税和贸易限制上与美国针锋相对，就有可能忘记那些紧迫的国内议程。生产力和供给侧效率、国有企业改革、增长模式的债务强度、创新挑战等等国内问题，对中国的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来说，都比美国的贸易威胁要严重得多。

罗奇还提到，美国非常担心自己作为世界领先创新者的角色正面临中国的挑战。中国则担心美国企图遏制它的发展和增长，改变它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美国的主流观点是，美国擅长打冷战，美国第一次能战胜苏联，第二次也会战胜中国。此言差矣。在GDP增速、储蓄、生产力这三个衡量经济实力的指标上，美国今天的效率都远远不如1947至1991年间的冷战时期。

因此罗奇表示，我们需要新的思路。他用以下几点建议作为结束语：

- 中美双方都需要改善彼此的市场准入，最好的方式是通过双边投资协定（BIT）。两国就此沟通了十年，如今却已经中止。
- 中美两国都应致力于重大的宏观经济调整。美国需要增加储蓄，中国需要减少储蓄。
- 网络安全不是一个双边问题，而是多边问题。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应该展示共同的领导力，形成一个有争端解决和执行机制的全球多边网络协议。
- 为确保对话，两国可以建立一个更永久性的机构，设置一位常务秘书，来汇拢双方的专家，全职处理对双方都有重大意义的重要问题。这将有助于为双方的交流提供一个更强大的框架。



莫里斯·格林伯格 (Maurice Greenberg)

C. V. 史带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以下总结自莫里斯·格林伯格发往会议现场的讲稿。)

莫里斯·格林伯格表示，中美贸易争端有可能破坏世界上最重要双边关系的稳定。不过在他看来，解决当前困境的办法是清楚的：

- 作为新兴市场，中国筑起贸易壁垒来扶植其新兴产业，美国等国家出于战略原因可以接受这一点；由于中国的巨大潜力，外国公司也一直在忍受。但如今，中国完全有能力在国内外市场与外国展开竞争。这就需要改变。为在华外资企业和本国企业提供平等待遇，从而吸引更多来自世界各国的企业，造福中国经济和人民，这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
- 紧迫感、相互尊重和真正的诚信对确保中美为未来达成协议至关重要。
- WTO 机制目前未被充分利用。这一机制有助于制定并实施此类协议。我们需要新的规则与其他改革，升级并改进 WTO 的运作方式。

格林伯格总结说，双方都应该明白，这不仅仅是贸易问题，其中涉及的地缘政治风险对美国、中国和世界来说都非常大。他呼吁两国领导人认识到，此时此刻保持建设性的开放关系比以往更加重要，在这种关系下，他们可以为了和平与繁荣加强双边互利合作，这并非零和游戏。



小组讨论

贸易和经济关系对中美两国至关重要。当下的关键是，我们是否有新的思路破解这一难题，实现创新？



曹德荣 (Cao Derong)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

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中美双边贸易是互利互惠的，而目前的争端正在伤害双方。

我对中美农业贸易的看法是这样的。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2019 年 5 月 1 日发布的《2019 年国家出口报告》，从 2009 年到 2018 年，美国对华出口支撑了超过 110 万个美国就业岗位；与此同时，从中国的进口提高了美国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福祉。

2019 年前 5 个月，中国农产品对美出口同比下降了 22%，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大幅减少了 57.4%。

我们呼吁美国在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关系。



马可·柯克 (Mark Kirk)

美国伊利诺伊州前参议员

作为伊利诺伊州的代表，我的目标是增加我们州的收入和经济机会。显而易见，像雅培、美联航这样的伊利诺伊州大雇主，它们的未来将由中国书写。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的出路是看各个部分的总和，这远远超过了整体。如果观察习近平和特朗普之争，会发现事情可以总结为一场关乎自尊的零和游戏。如果看 4000 亿美元贸易，你可以看子项，那才是最鼓舞人心的。把所有的子项视为双赢，这就是我想传达给中国政府代表们的信息。这些子项充满了机会。



刘遵义 (Lawrence Lau)

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高等金融研究院理事会主席

我对赢得贸易战的定义，是等一切尘埃落定后，中美双边贸易额将比贸易战之前更高。

贸易战对两国经济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可控、可管理的。如果中国出口全部停止，对中国 GDP 的伤害大约是 2.4%。如果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全部停止，对美国 GDP 的影响其实也只有大约半个百分点。

我认为关键在于找到重回正轨让双方都赢的方法。我认为这意味着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同时扩大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确实存在很多应当解决的问题和抱怨，比如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是因为美国

政府的坚持，也因为中国同样拥有很多优秀的探索者和发明家。中国已经走出模仿阶段，自己成为真正的创造者。强制技术转让真的已经成为了过去式。另一个问题是网络盗窃，两国政府应当联合打击网络商业盗窃。最后一个问题是间谍活动，间谍是世界上第二古老的职业，并且会存在下去。

如果中国和美国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展开竞争，世界将受益匪浅。



赵令欢 (John Zhao)

弘毅投资总裁

我同意艾德·福尔纳的观点，这次大阪握手不应让任何人抱有幻想“认为我们即将回到我们框架开始的地方”。

旧的世界秩序已经终结，新的秩序还未建立。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建立，因为这意味着要同陈旧的思维、陈旧的叙事作斗争，即谁是老大，谁是老二。但我们知道，中国将扮演重要角色。

我有两个看法。一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村，但我们的政治和政策制定者们依然是非常国家化的。另一个是，我们需要更多地去思考世界已经互相依存这样一个事实。因此，数字化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

我的建议是全球化 2.0 和一个更包容的数字化世界。国家领导人应当放弃那种成为世界第一的想法。新秩序将是包容、多边、价值驱动、以人为本的。

总结



冯国经 (Victor Fung)

冯氏集团主席

我们需要考虑新世界秩序、全球化 2.0，考虑对人民有意义、解决世界不平等这个终极问题的包容性增长。事实上，当今世界已经完全数字化了。从贸易体系到全球供应链，再到人们的需求，世界上的一切都已经发生变化。我们需要思考一个符合我们未来目标的新的世界秩序。为此，我们不仅需要在国家政府层面开展工作，也要在所有层面努力，包括企业层面，以及民间交往。

分组议题二 投资环境与技术创新



马秀红 (Ma Xiuhong)

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会长

马秀红会长在演讲中首先介绍了近 10 年中美双向投资概况，以翔实的数据说明目前中美互为重要的投资伙伴。她随后介绍了中国坚持扩大开放、改善投资营商环境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包括：

- 外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备案制取代了执行近 40 年的外资准入审批制，并对外商投资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 不断扩大市场准入范围，大幅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将限制措施从 6 年前的 190 条，分别缩减至 40 条和 37 条，严格落实“非禁即入”；
- 制定并颁布新的“外商投资法”；
- 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
- 强化外资权益保护，建立并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等各项制度；
- 国家实施 2 万亿减税降费措施，这也可以有效降低外商投资企业运营成本；
- 新的《外商投资法》首次将投资促进列入国家大法。

世行《2019 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营商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在世界各国的排名由第 78 位提升至第 46 位。根据中国美国商会 2019 年度《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2018 年近七成受访的企业实现盈利，超四成将中国视为全球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

就中美双向投资面临的挑战，马秀红认为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是经贸摩擦加剧对两国企业投资造成不利影响；其二是美方对外国投资，特别是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采取更加严厉的审查措施，明显遏制了中美双向投资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她还分享了促进中美双向投资合作谈几点看法：

- 两国元首在大阪达成“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的共识，应成为下一步双边经贸磋商需遵循的原则。
- 中方应做好自己的事情，落实中央制定的扩大开放、改善投资营商环境的重大措施。
- 加强和深化中美省州和城市间的经贸合作，团结一切反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积极力量，降低目前经贸摩擦的负面影响。
- 在条件成熟时，恢复中美投资协定（BIT）的磋商。中美 BIT 谈判自 2008 年起历经 9 年 34 轮谈判，至 2017 年 1 月已就文本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近两年处于停滞状态。
- 在 G20 大阪宣言中，与会各方确认致力于实现自由、公平、非歧视性、透明、可预期、稳定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希望美方能遵照上述原则，公正、非歧视性对待给予中国在美国投资的各类型所有制企业公平、非歧视性待遇。
- 赞同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教授提出的“中美应建立固定双边机制”的建议，讨论中美双方长远性、战略性议题。



王杰 (Jeremie Waterman)

美国商会中国中心主任

王杰在演讲中首先概述了美国商会成员的一系列抱怨。据他说，美国商会自 2010 年起一直强调，中国的强制技术转让、盗用知识产权、通过补贴和国家干预实现产业本地化以及市场保护等做法，使美国企业、工人和竞争力面临的风险加大。

王杰表示，美国商会及成员对两国关系现状和走势深表关注。他完全同意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所说的，贸易逆差并不是中美关系的核心挑战；尽管美国商会与美国政府“301 条款”报告的多数判断结果是一致的，但是，任何一方都承受不起双向关税或其他使这场冲突扩大的危险行动。

王杰指出，美国商会及成员对关税不断升级感到震惊，并反对这种做法。这些关税有可能破坏税收管理改革的成效，伤害了美国的实力和全球经济，破坏了全球贸易体系。

在当前环境下，美国商界担心美中两国利益重叠的圈子正在缩小。王杰强调：

- 人们担心中国模式的扩张。对大多数美国公司和工人来说，问题不在于必须要面对中国的竞争，而在于竞争的条件（不透明）。
- 从美国企业的角度看，国家安全问题应放在贸易谈判之外解决，除非谈判重点是解决“301 条款”报告所述的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等核心问题。双方冲突的升级和扩大，正在进一步损害两国企业之间的信任，加大它们面临的风险。

- 民粹主义不会消失。美国人对中国态度的转变早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就出现了，在他离开后肯定还会继续。两党在国会的关注点不是由反贸易、强硬反华的保守派引导，而是由参众两院亲贸易、支持商界的议员引导。这在过去 20 年的中美关系中是未曾有过的。
- 美国商界担心，为在全球化经济中打造本国冠军企业，中国政府过度介入像中国这样规模的市场，这会不断加剧零和的对抗性反应。

王杰认为，对美国商会和美国企业来说，接受孤立主义，甚至推动脱钩，都不是办法。目前迫切需要在商业领域采取建立信任的措施，避免两国灾难性决裂，因为其后果是严重和持久的，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可以幸免。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不符合两国利益，将侵蚀两国和各国的增长与就业，使所有国家的蛋糕变小，变得更不安全，更不繁荣。他提供的解决方案包括：

- 谈判提供了解决严重关切的最佳机会，而这些关切正在快速侵蚀中美关系的基石。
- 如果能达成一项全面、高标准、可核查和可执行的协议，就可以为经济和商业关系的某些方面重建信心与信任奠定基础。
- 永远不要让政治阻碍专业谈判者取得进展。同样重要的是，两国政府要找到前进的路径，任何一方都不应通过采取大规模行动来告诉对方出了问题。



王昌林 (Wang Changlin)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在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并不乐观的情况下，王昌林在演讲中强调中美应加加强科技交流与合作，加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到来，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他认为，中美两国应加强科技与创新合作，有三点理由：

- 中美两国在推进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中美两国研发投入合计占世界比重超过 40%，研究人员总量占比超过 40%；
- 中美两国在科技与创新方面互补性很强。美国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而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潜力巨大、人力人才资源非常的丰富、产业配套齐全。中美科技与创新合作已经形成了相互依存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
- 加强中美两国科技创新合作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中美合作有利于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人口与健康、资源与环境等重大挑战。麦肯锡的报告也指出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将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

就如何推动两国科技创新合作，王昌林还提出了三项建议：

- 着力推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的突破。面对越来越复杂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任何一个国家要单独完成都是非常难的，一定要通力合作；
- 加强科技人员的交流与合作，而不是限制留学生科技人员的交流，支持学术机构开展共同的研究，这是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
- 加快构建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管理体系和政策框架。



小组讨论

中美贸易必须解开这个扣，即美国在中美贸易中吃亏了吗？中国是某些美方人士所说高新技术的“小偷”吗？未来美国要不要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还是继续以冷战思维、国家安全来排斥中国的投资和贸易？这都是该小组讨论的主要议题。



沈南鹏 (Neil Shen)

中国红杉资本创始人及合伙人

过去十几年科技迅猛发展，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科技发展形成了正循环。也就是说，科技能够很快地应用在产业上，并且应用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反过来让更多的资金在高端研究上进行推动。

这个广度和深度当中有中国的贡献，中国不仅提供了广泛的市场，还提供了非常重要和巨大的场景应用空间。如果说全球市场少了中国，同样 100 块钱的科研成果，可能就只能带来 60 块钱或者是 70 块钱的产出，加上中国可能就是 100 块钱。

中美都有大量科技研发的 IP，有很多的商业开发需求，合作空间非常大。科

研究突破转化具有高风险，需要“聪明钱”来推动其产业应用。这个聪明钱，中国是一部分，美国是一部分。过去十几年里，美国的创业企业都非常欢迎中国资本，相信美国的科学家都非常愿意看到中国企业的参与。



田力普 (Tian Lipu)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理事长

尽管知识产权问题是中美商贸谈判中一个难点问题，但我还是乐观认为我们最终还是能够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为什么？

40年前，中美1979年1月1日建交，当年就签订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协议——《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中美贸易合作协定》，其中就已经都有知识产权条款。

1787年美国就把知识产权保护列入宪法，而中国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第一步是1983年的《商标法》，跟美国的差距是196年。中国并没有因为两个世纪的差距裹足不前，而是在奋力追赶：30年前，美国来华申请注册专利的数量是1万件左右，中国人到美国是个位数；2000年前后，美国来华申请专利超过2万件，中国到美国有100多件；2018年，中国企业到美国申请发明专利超过3.1万件，美国来华申请专利3.8万件。

40年间，总计将近100万家美国企业来到中国投资建厂生产。如果说中国的投资环境、知识产权保护一团糟，他们会来吗？中国投资、知识产权还在不断完善发展，问题有，坐下来讨论、协商，大家是可以达成协议的。



郭涛 (Jerry Guo)

高通公司全球副总裁

我想中国下一个红利应该是开放制度的红利。

一个国家想进入技术链和价值链上游必备的五大要素：1) 政府巨大的投入，2) 获取先进技术的渠道，3) 庞大市场，4) 有效竞争和创新制度，5) 足够的人才供给。中国相对弱的是获取先进技术的渠道和推进有效竞争和创新制度。

中国的知识产权过去 10 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现在有一个认知和现实上的差距：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人期望中国要按照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行为方式来做事，而不是再按照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有两点建议：第一，中国政府要重视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一致性；第二，中国的产业政策的运作需要更加市场化。



周兵 (Zhou Bing)

戴尔科技集团全球副总裁

我有两个观点：第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目前的位置是由中国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决定的。第二，技术的发展会改变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必须要以前瞻性的观点去看待我们的经贸关系。

中美贸易的增长是和日美贸易、韩美贸易、台湾与美国的贸易、东盟与美国的贸易的下降同时发生的，这是因为中国独特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带来的，包括在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在港口、物流、海关、外汇等领域的效率具有明显优势。供应链是中国一个非常强的优势，不仅在于工业门类的完整，还在于持续不断的供给；能够持续不断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劳动力，这样的经济体在全球不多。

如今，技术的发展非常快，数据是将来驱动整个经济发展的核心能源，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远超我们的想像。贸易谈判不要局限于现有的贸易合作，要看到更远的、未来的发展空间。



赵昌文 (Zhao Changwen)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

科技创新，过去主要是单一技术的创新，今天更多是技术产业综合体的创新。也就是说，在这个创新链或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上，每一个参与国家都为最终创新做出了贡献。中美贸易摩擦正在对这一全球的创新范式带来很大破坏性。

美国在创新领域的极限施压，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加速完成从技术的依赖到技术的自立。中国目前市场开放、技术依赖的状态，有体制和政策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应用场景的原因。全球化的分工有其合理性，因为当全球已经有了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某种程度上，自己做并不是最优的选择；但没有选择的时候，就会加速中国从技术依赖到技术自立的转型过程。

希望，像任正非先生所说，中美应该在高山顶上拥抱，共同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文明做出贡献。

总结



魏建国 (Wei Jianguo)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美国是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它根本不可能制定一个对自己不利的规则，因此美国在全球贸易中吃亏是不可能的事，是违反人之常情。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对中国也是一样的。

分组议题三 宏观政策



白莉娟 (Jan Berris)

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

白莉娟在演讲中提出，人们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担忧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互惠。如今许多美国人感到担心，因为他们深深地感觉美中两国关系缺乏互惠与公平，其中的不对等包括：

- 外交待遇：中国大使和其同事可以在美国随意旅行，可以去任何希望去的美国机构；而美国在中国的外交官缺乏这样的自由，许多人甚至不能访问中小学和大学。
- 学术机构：美国有近100所孔子学院，而中国只允许美国政府在特定的大学中开设几个“美国角”。现在这些“美国角”也几乎都关门了。
- 媒体：中国封锁各种新闻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和几家社交媒体，并且不能善待记者。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在中国驻美记者身上，也没有发生在为他们工作或接受他们采访的人身上。
- 签证：美国人——通常学者，因为写过或谈论过中国政府认为的敏感话题，而被拒绝进入中国。

第二类是美国人不确定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

第三类是关于两国社会不同的文化价值观。

- 美国是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社会，中国则更加同质化。两国都指责对方处理内部问题的方式，而不是集中精力解决各自的问题。
- 与法治有关的事情是许多美国人基于价值观的另一担忧。白莉娟认为，人们在谴责这些问题的同时，也需要承认中国在若干法治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白莉娟感到痛心的是中国失去了美国商界和其他方面的热情支持，比如非营利部门和学术界，它们对中国的支持也在减弱。在她看来，不幸的是反华情绪成为当前民主、共和两党少有的共识之一。她同意艾德温·福尔纳的警告，即中美两国关系已无法回到特朗普之前的状态。未来将是不同的，两国都必须学会正视彼此的差异，弄清如何最好地利用这种差异，使两国关系比从前甚至更好。

白莉娟最后表示，她选择乐观，因为她相信中美两国人民，能取得 1972 年“乒乓外交”成功的人民是很会变通的。



朱光耀 (Zhu Guangyao)

中国原财政部副部长

朱光耀的演讲围绕中美关系现状和前景框架下的宏观政策问题。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美合作带动全球共同应对挑战。在全球经济增速不断被下调的当下，特别需要国际合作，尤其是中美两国的合作。

他强调，在全球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不大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政策协调，特别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就变得更为重要。

朱光耀还以 IMF 建立防火墙为例，指出要建立和巩固真正的金融防火墙，中美两国的合作至关重要。

他的讲话要点包括：

-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正是中美两国的政策合作推动了 G20 峰会的建立，才有过去 10 年全球在 G20 框架下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合作。
- 过去 10 年，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4 轮高达 2 万多亿美元，但是其他国家并没有指责美国在操纵利率。美国财政部对于汇率操纵国的定义三条：
 - 美国对于某一国家的贸易赤字超过 200 亿美元。
 - 该国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达到 3%。
 - 该国对外汇市场上汇率干预所积累的金额超过 GDP 的 2%。这三条要同时存在才作为汇率操纵国。但现在，美国的商务部要把反倾销政策同汇率挂钩，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对于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严重的制约。
- 我们在金融危机过程中，通过 G20 的努力，特别是中美两国的合作，促进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防火墙的建立。但美国在今年 4 月份 IMF 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表示，他们不再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的份额改革。要真正的建立和巩固的防火墙，建立强有力的以份额为基础上的国际货币基金体系，中美两国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
- 艾德温·福尔纳博士从媒体得到的消息“中方要求在恢复贸易谈判之前取消关税”，这个是不准确的。实际是，中方发言人表述的是，“中方要求在谈判达成成果之后，双方要取消全部的关税”。



小组讨论

这个小组将从宏观政策的角度来探讨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杜克雷 (Clayton Dube)

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院长

中美关系确实非常糟糕，而且可能会更糟。我们的工作是要确保情况不再恶化。我们必须始终认识到这一事实，即中美关系有广泛的受众，不仅有决策者、政治家、领导人，也包括广大民众。

中美关系是什么？事实上，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是盟友，而是合作伙伴。如今，我们的关系到了一个临界点。

中美关系向来很复杂，未来也许一直如此。我们是两个大国，存在利益分歧，但我们也有许多共同的关切。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必须着眼于这些共同的关切。

这场贸易战与贸易逆差无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今天的经济，而是明天的经济。我们必须从这一点入手，找到促进健康、公平竞争的方法。

唯一的途径就是进行广泛的对话。有些关切会影响到相互信任，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社会正在老龄化，我们共享着这个有限的星球。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处理好我们自己的关系，以及我们对一个更加稳定、繁荣世界的承诺。



杰弗里·雷蒙 (Jeffery Lehman)

上海纽约大学首任副校长

我们必须关注的是，中国的美国朋友曾经拥有的设想破灭了。

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中国的大多数美国朋友都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不

断扩大，其结构会很快与WTO的其他发达成员趋同。其中三个设想尤为重要：第一，相对于私人市场，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会迅速收缩。第二，除了少数敏感行业外，外国企业很快会获得真正的国民待遇。第三，外商在华投资创业不再以技术转让为条件。这些设想都没有成为现实，而当这些期待落空时，面对脱钩压力，中国的美国朋友们选择了沉默。

我相信这是个错误。并不是只有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规范趋同或者脱钩这两个选项。产业政策不同的国家仍然可以享受贸易带来的某些互惠互利。

脱钩造成的经济损害不会是灾难性的。我更担心脱钩可能造成的另一种损害，即价值观、文化和人文精神的损害，正如赵令欢在阐述“全球化2.0”时所说的那样。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壁垒确实削弱了全球的繁荣，但阻碍思想的自由流动却是灾难性的。来自两国的一批杰出学者正在研究第三种方法，即“和平共存（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我希望这会是未来贸易讨论的一个核心方式。

同时，我们需要美国的中国朋友和中国的美国朋友站出来，保护我们的民间伙伴关系。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在准确理解中美两国未来十年将如何演变的基础上，确保这种伙伴关系以公平、相互尊重的方式延续下去。



傅育宁 (Fu Yuning)

华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就中美贸易关系我想谈三点。

第一，合作对双方有利，对抗让双方受损。尽管中国在不同领域有许多领先优势，但中国仍然严重依赖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键技术。制造业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与美国等经济体产业价值链合作的结果。脱钩无疑意味着两国都将蒙受巨大损失。

第二，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消费市场，拥有超过14亿消费者，以及世界最庞大的中产阶级。在自然资源、市场，当然还有技术发展方面，中国和美国具有高度互补性。

第三点是关于技术发展的日益一体化。虽然我们是一家中国国有企业，但华

润在许多领域有很强的商业竞争力，我们是以商业的方式竞争，没有任何政府补贴或优惠政策。中国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就像是股东。增进中美理解的最好方法，是邀请美国朋友来参观我们，看看我们作为一家中国国企是怎样运营的。

中美贸易的平衡肯定是复杂的，对中美双方来说，切实可行的做法是搁置某些分歧，寻找更多的共同点。当前更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解决争端的机制，帮助双方解决未来经贸互动中出现的挑战。



刘尚希 (Liu Shangxi)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中美之间存在分歧很正常，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但是把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整体问题和局部个体的问题都混在一起，就会导致这种分歧难以解决。

美国在推进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过程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也导致了全球经济体系的不平衡。为什么说美国导致了这个不平衡呢？因为美国是体量最大的。体量大的引力大，其他的经济体自然就会跟着美国的经济体系在跑。美国哪些方面引力最大呢？

第一是美元。美元的引力是最大的，美元是现在国际货币，美国输出美元获得铸币税，其他国家都使用美元，全球经济体系失衡由此产生，美国是逆差，其他国家就是顺差。

第二是消费。美国的消费引力巨大，大家生产出东西供应美国市场、美国消费者。美元结算、消费巨大的综合作用产生的不平衡，在美国国内表现为美国的储蓄和消费的失衡。美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带来了整个全球体系的不平衡。

那么，宏观的问题就要用宏观的办法解决，只关注微观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需要全球的宏观政策协调来解决宏观失衡的问题，每个国家都要努力。中美之间以及全球各个国家之间都必须合作，因为已经是一体化了，已经是一个“地球村”了，你不合作想脱钩，就会产生巨大风险，这对谁都不利。



南存辉 (Nan Cunhui)

正泰集团董事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美国过去老是打压中国的国企，现在又开始打压中国的民企，看谁有先进的技术就打谁，美国的商业价值观到底是怎么了？作为民营企业家，我建议：

第一，要从现实、历史、从结构上分析形成中美贸易问题的原因，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再到计算的方法，回归理性，就事论事。

第二，要正视中国政府在贸易平衡上做出的努力。中国的政策环境、投资环境、法律环境越来越好，改革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不仅是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受益，全世界都受益。

第三，中美两国政府都应该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和维护多边贸易的机制，来促进贸易公平包容的发展。

总结



陈文玲 (Chen Wenling)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通过讨论，我们小组形成了三点共识：

第一，中美双方要解决互信的问题，要有信任，有理解，理性处理中美贸易问题。

第二，美国贸易战的做法对于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对于世界经济都是不利的。

第三，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实际上都在向着市场化方向快速发展，美国应该正视中国和中国企业发展的现实，正视中国宏观、微观政策改革和开放的现实，这样才可以真正的解决中美经贸问题。

分组议题四 得克萨斯州和美国中部地区代表谈“合作”



方大为 (David Firestein)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

方大为在演讲中提出一系列问题：中国是美国的死敌，还是不可或缺的伙伴？中国崛起与美国的安全与繁荣是不是固有矛盾，两个国家能否同时取得成功？“中国梦”和美国的全球主导原则能否存在于同一时空，或者，这个世界不足以大到让两个国家和平共处并充分发挥其潜力？这些都是当前美国有关中国论战的核心问题，方大为称之为“一场有关美中关系的心脏和灵魂的论战”。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方大为表示，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是从前总统布什这里得到的启示——老布什总统断然拒绝中国是美国敌人的观点。2007年，老布什总统为这种关系提出了十分不同的愿景：“我热爱中国人民，”他写道，“我对世界的梦想之一，就是这两个强大的巨人不断致力于全面的伙伴关系和友谊，这将为世界各地的人民带去和平与繁荣。”

方大为注意到，老布什总统的美中关系愿景和华府精英今天对中国的态度有着巨大落差。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美国政策的本质、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方式、基于事实决策的重要程度。

- 政策本质：美国正在快速放弃罗纳德·里根和老布什的有限政府、亲市场、亲贸易原则。
- 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方式：特朗普总统从一种政策立场或观点向另一种政策立场或观点的摇摆多变，破坏了全球贸易的两个重要条件：一致性和可预测性。
- 基于事实决策的重要性：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是基于“有选择性的事实”，而这些在某些圈子里被称作显而易见的谎言。

方大为还表示，当前中美关系的紧张不只是因为特朗普总统及其顾问和盟友。事实上，中国也负有相当大的责任，因为美中贸易关系多年来存在严重的不对称，缺少互惠。在他看来，中国应该像几十年来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和服务一样，对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开放。

同时方大为认为，把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敌人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最不幸的战略错误之一。他反对现政府对中国采取的做法，不是因为这样做对中国不利，而是因为对美国不利。

最后方大为强调，中国既是美国强大的竞争对手，也是美国成功不可或缺的伙伴和主要利益攸关方；准确认知这两句至关重要的表述，美国人就能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正确对待中国，让中美关系走上正轨。



鲍勃·霍顿 (Bob Holden)

美国中部地区美中协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鲍勃·霍顿在演讲中阐述了美国中部地区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要影响美国，就必须到这个地区来插旗。

为了阐明观点，他把关注点放在三个重要领域：文化建设、教育关系和商业纽带。他认为，如果能将这三者结合起来，那么经济会更加强大，两国的合作伙伴关系会更加牢固。

- 过去 20 年，美国中部地区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政治领导人。
- 该地区拥有一些国内最好的大学。在美国排名前 100 的大学中，有超过 30 所在中部地区。这里还有大约 200 个学术机构，虽未达到顶级，但与顶级机构保持着密切联系。中部地区特有的文化因素很重要，因为它奠定了伙伴关系的基础。
- 当人们谈论制造业、农业和关税时，他们不仅仅是在谈论美国，他们也在谈论中部地区。美国 10 个制造业大州有 6 个位于该地区，20 个农业生产大州约有 16 个位于该地区。当人们谈论关税时，他们不是在谈论关税对全国的影响，而是在谈论关税对全国特定地区的影响。

霍顿建议人们必须设法搭建理解与合作的桥梁，这样才能继续前行。中美两国必须处理的最困难问题，是如何将经济竞争与国家安全问题分开。



杰夫·莫斯利 (Jeff Moseley)

得克萨斯州商业联盟首席执行官

杰夫·莫斯利在讲话中回忆了邓小平 1979 年对美国的访问。他说，很荣幸，40 年前卡特总统邀请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问美国，并访问了得克萨斯州。他表示很高兴代表得克萨斯州继续这场始自邓小平访美的对话，因为该州与中国建立了关系。据他介绍，得克萨斯州是美国第一大出口州，中国是它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墨西哥和加拿大。

莫斯利同时指出，美国和中国有很大的机会向前发展，如果中美贸易谈判失败，风险将是巨大的。

在他看来，得克萨斯州的人民正致力于在得克萨斯商业联合会内部创建“得州—中国贸易投资联盟 (TACTIC)”。这样的联盟将确保中国资本不会自然流向美国东海岸或西海岸，从而使得克萨斯也成为投资增长的地方。

莫斯利还重申，得克萨斯州打算保护现有的中国投资，确保已经来到该州的公司有机会扩大并增加它们的就业岗位和工资。



吉米·弗兰尼根 (Jimmy Flannigan)

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议员

吉米·弗兰尼根认为，人们从市政角度开始思考国际关系非常重要。他认为美国在联邦和国际层面都缺少这一点。

他指出，美国人没有单一的文化或观点，城市领导人知道的一个重要却不为人知的事情是，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没有看法。

弗兰尼根认为任何关系都不能简单地被视为输或赢，否则只有输家。城市领导人知道，唯一的繁荣是共同的繁荣，拥有强大的经济，拥有繁荣，也就拥有了和平。他表示在全球范围内更是如此。人们越是将经济成功紧密地联系起来，就越能实现更持久的稳定的世界和平。

他指出，国际决策对美国的地方城市有影响，对中国也一样。因此，城市领导人必须务实，他们必须着眼于共同的繁荣，着眼于一个有明确目标、摒弃党派政治的未来。

中美关系前途未卜。但弗兰尼根认为，人们知道美国的未来和美中关系的未来不取决于华盛顿目前在台上的这些人。相反，它将由美国下一代领导人来决定。而这个未来是美中两国城市领导人可以合作建立的下一代两国关系未来，是迫切需要美中两国城市领导人在全球村像邻居一样携手创造的未来。



小组讨论

中美关系始于 40 年前，当时改革家邓小平访问了得克萨斯州的西蒙顿。本小组讨论者来自得克萨斯和美国中部地区，他们谈到得克萨斯州和他们所代表的社区，特别是当地与中国的商业往来、贸易、投资与合作。



徐莉 (Li Xu)

M&A 国际创始人

M&A 国际 (International M&A) 是一家全球性的管理咨询公司，旨在帮助企业
在全球开展业务，包括合并、收购以及交易协定的谈判和发起。



威尔·尼科斯 (Will Nichols)

Core Engineering 项目工程师

中国已经表示有可能从美国进口更多的产品，但价格必须合理，产品必须是它需要的。当然，这就是生意。只要你做任何交易，不管数量我们是否满意，那都是好事。

我们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我们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又何必美国一定要像中国，或者中国一定要像美国呢？

得克萨斯州是美国最大的原油出口地，有大量石油、天然气，特别是液化天然气。现货市场的液化天然气超过 50% 是运往中国。

如果得克萨斯州有一家中国公司收购美国的资产，再按我们想要的价格把产品出口到中国，那会怎么样呢？那简直太对路了！它让我们的竞争优势比我们在自己市场已有的优势更大。这也符合本届政府向中国出口更多美国商品的目标。为什么要与在得克萨斯州的中国公司合作呢？因为美国人花的钱比他们应该花的多，而中国人存的钱比他们应该存的多。因此，创建一个美中合资企业，利用这些资产，并且与两国政府合作。这才是聪明的关税计划。



玛丽娜·巴加瓦 (Marina Bhargava)

大奥斯汀亚洲商会首席执行官

大奥斯汀亚洲商会管理着大奥斯汀地区的亚裔美国人商圈。奥斯汀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大城市，它的人口每 20 年翻一番，而亚裔美国人的增长还要快一倍，每 11 年翻一番。

奥斯汀的独特之处在于，这座城市资助并且支持本地的少数族裔商会。这里 20% 的居民是在外国出生的。这就是我们存在的原因，我们在帮助搭桥。



安德鲁·卡兰科 (Andrew Carranco)

拉雷多商会董事

拉雷多是美国最大的港口，每天有 1.5 万辆拖车以及 24 至 32 列火车在忙碌。拉雷多每年的贸易约达 3000 亿美元，其中 2920 亿是与其最大贸易伙伴墨西哥。虽然中国是拉雷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拉雷多每年与中国的贸易额大概是 40 亿美元。我们希望把这个数字再提高一点。

拉雷多正在建造最大的“外贸区”，帮助促进与墨西哥、中国的贸易，并将美国纳入其中。

拉雷多美丽而独特。我们是美国人，但我们说西班牙语。美国还没有哪个地方是这样的。



方大为 (David Firestein)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

尤其在联邦政府阻碍我们两国之间合作之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真正发挥各州、城市、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参与的力量。民间接触的必要性、价值和影响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

就能源资源来说，得克萨斯州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单一实体，拥有与沙特阿拉伯一样多的石油。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石油、液化天然气、风能、太阳能都占第一位，煤炭和水电也名列前茅。所以我们是一个能源宝地。我们可以让事情有所不同，把美中关系的指针拨向积极的方向。我很喜欢威尔·尼科斯的观点。我们需要做一些有创造性的事，打造有积极意义的双重或三重底线。

我们可以让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来个得克萨斯规模的猛降，通过出口我们拥有、而中国需要的液化天然气，把对中国的逆差减少 1000 亿或 1500 亿美元。这么做的唯一障碍是政策。我们需要一个稳定和可预测的政策环境，从而让美国人和中国人能够共同努力，给达成这一目标所需的基础设施投入成百上千亿美元。

乔治·布什中国基金会提出“美中能源自由贸易与投资协定”的构想，让我们把能源从标准的贸易讨论中移出来，把它作为特例。我们正在向能够接近特朗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的人推销这一想法。

我完全同意弗兰尼根市议员的意见，中美关系的未来在下一代和下一代。

总结



罗宾·古德曼 (Robbin Goodman)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商业项目和企业事务主任

我们奥斯汀本地的品牌已经通过天猫销售到中国市场。我们不仅要让公司向中国市场销售，还要了解中国市场，了解当地人民和网络。我们代表团来这里不仅仅是为了开会，实际上我们还想要让生意实际做成。

议题二

中美关系：现在与将来



尼尔·布什 (Neil Bush)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创始人及董事会主席

尼尔·布什在主题演讲中回忆他 1975 年第一次到中国，当时他的父亲老布什是美国驻北京的“骑自行车大使”。这位前总统在塑造美国对华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他常常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尼尔·布什认为，自己观点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父亲，以及他本人 44 年来的 140 多次访华经历。

他表示，个人自由是美国价值体系的核心。他赞叹过去 44 年在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在最短时间内有更多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

但随着中国崛起，反华言论开始甚嚣尘上。他反驳中国处处利用美国为的是抢夺主导地位的观点。相反，他认为 40 年来两国商业、教育、外交和文化关系的加强给中美两国带来巨大的互惠互利。两国关系虽有坎坷，但也形成了典型的双赢局面。

中美关系的核心在于，中国究竟是美国天然的朋友，还是美国的敌人？尼尔·布什表示，他父亲相信，中美两国建立深厚友谊的历史渊源。他认为，将两国团结在一起的因素比分裂因素更多，而两国关系根基之深足以抵御当前的风暴。

尼尔·布什列出当前的失调导致两国关系被破坏的几个原因：

- 中国经济崛起这一事实引发人们的焦虑。但他认为，零和与输赢心态是错误且幼稚的。事实上，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是自然产生的，是因为较富裕的国家向较穷的国家购买了更多产品。
- 对中国妖魔化的加剧源自美国民族主义抬头，这反映在反移民、反华以及“美国优先”等言论中。
- 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只有西方式民主才能为中国人民提供全套自由。但本质是，美国的政府制度和民主制度对中国不起作用，正如中国的制度不适用于美国。

尼尔·布什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当中国的某些项目受到全球广泛评论时，中国应该让自己的意图与项目实施尽可能透明。
- 美国不应干涉中国的内政。
- 美国政府应采取老布什的领导方式，即着眼于创造和维持多层次的频繁对话，力求建立信任，换位思考，了解彼此好的一面，考虑文化差异，尊重、鼓励并抱有希望，诚实、直接且有针对性。
- 大家有必要发声，来平衡这场美中关系的论战，逐步实现老布什加强两国关系的愿景，在应对人类日益增长的挑战方面实现真正的合作。
- 两国必须在气候变化、流行性传染病应对、反恐、空间探索、医学突破和技术发展等全球问题上携手合作，让世界更安全、更和谐。

总之，尼尔·布什表示，更紧密的商业关系，美中两国市场向对方企业开放，将助推高增长与繁荣，提升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更紧密的外交和战略关系，将有助于全人类应对严峻的挑战，让地球上人们的生活更和平、更可持续。



威廉·欧文斯 (William Owens)

Red Bison 咨询集团执行主席、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

威廉·欧文斯在演讲中提到，他正在撰写的《中美 2039》一书试图描绘 20 年后中国和美国是什么样子。在书中，欧文斯提出一个核心问题：如果人们知道 2039 年是什么样子，他们会在 2019 年做些什么来阻止它发生？

在他看来，人们普遍认为到 2039 年中国的 GDP 将显著提升。如果真是这样，而且如果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机器人技术在未来 20 年有显著进步，那么毫无疑问中国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力量。美国将是老二。

但欧文斯认为不会有一场冷战。他相信中国是一个伟大而可敬的国家，会成为一个更强大、更成功的国家。

欧文斯给出三条建议：

- 人文交流项目十分重要，但必须有领导力推动才能实现。

- 2039 年的世界与现在截然不同。具体来说，世界会变得透明，这意味着战略威慑的效果将大打折扣。人们需要弄清楚，该拿中国和美国这两个能够透明看世界的国家怎么办。中美两国应该一起有组织地讨论这些重要技术。
- 世界正在变得更糟。海洋和空气受到污染，气候持续变暖。中国和美国可以发起一项政府间倡议，研究所有可以真正扭转现状的技术。

欧文斯最后表示，十年前他在董建华先生的帮助下发起了“三亚倡议”。“三亚倡议”证明，真正的信任是存在的，这种信任可以建立关系，建立友谊。



董建华 (Tung Chee-hwa)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美交流基金会创办人、主席

董建华在演讲中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最近在大阪的会面，带来了中美关系再次向前发展的希望。贸易谈判总是艰难的，挫折在所难免，但他相信常理最终会占上风。

董建华先生提到，现代中美关系始于 47 年前，从那以后，两国领导人都奉行了确保两国关系积极向前发展的政策。鉴于当前的中美关系，他建议：

- 对所有人来说重要的是，从历史根源到对未来的规划，要了解中国首先要解决什么。过去 40 年间，中国在提高经济和改善人民福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然而，为了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际上，中国将继续在贸易、商业、投资等领域与其他国家合作；在国内，中国将寻求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发展，继续走改革道路，对外开放经济。它的最终目标是要成为发达国家。
- 美国一直担心中国的快速崛起，但中国并不想成为霸权国家，因为中国的基因里没有这种东西。中国从来没有寻求扩大疆界、输出治理方式、传播极端意识形态，或征服其他文明。中国倡导的是和平，以及与所有国家共享繁荣。
- 中美关系良好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整个世界。
 - 中美贸易关系将变得越来越互补。
 - 中美关系不仅仅基于贸易、商业和金融。两国在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方面一直保持着合作，比如 2008 年金融危机，比如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未来世界将面临许多其他挑战，比如全球人口迁移、核武器扩散、网络安全，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所有这些领域，中美合作都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合作只会带来更多机会，来吸引其他重要国家支持这些努力，并让这些努力取得最后的成功。

- 有些美国人说，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截然不同，怎么可能实现合作？答案是，两国的政治制度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们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并且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两国政治制度不同是完全有其道理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人民服务。中国的制度适用于中国，这不应成为两国合作的阻碍。

董建华最后表示，脱钩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当然也不符合全世界的利益。中美合作越紧密，两国就会越好，世界也会越好。



周文重 (Zhou Wenzhong)

中国 - 美国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博鳌亚洲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

周文重在演讲中指出，回顾中美关系 40 年来的发展历程，最重要的经验启示就是，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

他表示，中美双方应回答好战略互信这一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问题。“对华遏制、脱钩、对抗、文明冲突论、新冷战”等都是严重的战略误判，如果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将中美推入“修昔底德陷阱”。

对于两国间的分歧，周文重表示，不能让矛盾分歧来定义当前的中美关系，关键是要正确对待和处理。双方应当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采取建设性方式加以管控。

他的演讲要点包括：

- 40 年前，共同利益推动了中美建交。40 年后的今天，还是共同利益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相互依存、利益交融是当今时代的最鲜明特征。各国唯有选择对话而非对抗、合作而非摩擦、共赢而非零和，才能更好维护自身利益，为世界带来更多福祉。
- 中华民族以“和”为核心的价值观决定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最大的战略意图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与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不是前苏联，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因为这条路行不通，也不受欢迎。
- 中国不会成为美国，更无意取代美国。中美之间肯定有竞争，但应是积极意义的竞争、符合规则的竞争。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是机遇，美国的繁荣对中国也是机遇。双方应当加强联通而不是彼此脱钩，不能让偏见和误判左右未来的中美关系。
- 出现各种分歧在所难免，但凡事都要看主流。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远大于摩擦。

-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没有赢家，双方的分歧终归要通过平等对话磋商加以解决。但任何谈判都是有原则和底线的，对于事关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中国不可能让步。美方应从中美关系大局和自身利益出发，慎重妥善处理，防止这些问题对两国关系造成严重冲击和损害。
- 人文交流事关中美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美国对所谓“中国威胁”反应过度，最终会损害美国自身利益。

作为中美关系 40 年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展望未来，周文重表示对中美关系发展仍充满信心。只要双方牢牢把握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正确方向，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下一个 40 年一定能行稳致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人民。



小组讨论

贸易是问题，但并非真正的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或许远比贸易更深刻。如果不是贸易，那究竟是什么？



艾江山 (Karl Eikenberry)

斯坦福大学美国 - 亚洲安全倡议项目主任

关于代理人与外部环境的问题，代理人真的非常重要。就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来说，作为代理人的特朗普总统非常重要。就中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来说，作为代理人的习近平主席也极其重要。这两人在中美关系中都非常重要。

我想谈谈对外部环境中关于安全领域的两点看法。

一是特朗普总统上台前几年，美中两国经济交往就已经出现安全议题化趋势。上世纪 70 年代，如果你问美国五角大楼或中国中央军委领导人，哪些技术对国家安全最重要，他们的回答很可能是“这些重要技术约 70% 是由政府专营合同控制的”，它们是不属于商业领域的。但现在我们看到的似乎完全相反，这些重要技术约 70% 属于商业领域。这种正在快速扩散并对国家安全产生深远影响的技术在数量上是惊人的。

另一点是地缘政治。美中两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竞赛肯定是大事。美国一直在讲自由航行，中国一直在讲海上主权。发生事故和误判的风险将非常可怕。

我担心的是长期内出现更多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美国此前对双边关系的担忧一直是贸易失衡，但现在变成了全球竞争。一个担心是，随着中国在全球各地推进野心勃勃的项目，如“一带一路”倡议，一种替代体系或秩序已经开始建立，这将导致地缘政治后果。

当然，价值观对增进相互理解也非常重要。不讨论政治价值观，对中美关系的分析肯定是不全面的。



大卫·兰普顿 (David Lampton)

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阿克森伯格-勒伦学者

我们要想取得成效，就必须先谈谈过去 50 年我们致力的美中交流所取得的合作：航空安全领域合作、2003 年 SARS 疫情、中国分享其疫苗，等等。所以，让我们先来谈谈什么是合作，以及它给两国社会带来的益处。

我赞同艾德温·福尔纳的观点，不要以为如果美国政府换届，一切就会回到从前。但我们也不要因此得出“如果美国政府换届，一切都不会改变”这样的相反结论。无论美国下届政府是共和党，还是有不同特点的民主党，政策过程都应当让人民可以了解，并知道事情是可控的。

我也赞同艾江山的观点，乱七八糟经济关系背后的关键问题是安全。我们需要就此展开战略讨论。

我有两点建议。

首先，地方政府之间要合作。华盛顿失灵的时候就转向地方。我们是联邦政府，所以各州有能力，有领导力，也有动力。

第二，我们要对子孙后代负责。我建议大家都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到中国或美国走一走，让他们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或美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戚振宏 (Qi Zhenghong)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现在美国国内有一种看法认为“双输好过双赢”，与中国打贸易战，美国是受损，但只要中国损失更大，美国就赢了。这种想法的背后有三层意思：一是“美国吃亏论”，美国是中美贸易的吃亏者和受害者；二是觉得美国块头更大，承受能力更强，美国与中国对抗一定能胜出；三是认为只要能拖住中国发展，即使双输也是值得的。

我觉得这种想法背后的问题，还是如何看对方。美国是把中国看成是朋友、伙伴、竞争者，还是把中国看成敌人？如果把中国看作敌人，那么任何谈判都是表面的，不能解决深层次的问题。

这种“双输”的想法十分危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如果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全面加征关税，美国家庭年损失将飙升到 2200 美元，美国经济将陷入衰退。美国有学者提出，美国执政者忙着向公众作出空泛保证，而中国政府则让人民做好吃苦准备、打持久战；这种情况下，谁更能承受双输结果？中美恶性竞争甚至对抗必将导致两国及世界经济失速、全球治理失序。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积极支持美国召开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提议，稳定住了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2009 年访华时曾说“在同一艘船上的人必须以和平方式才能共同过河”（When you are in the same boat, you should keep the peace on the crossing.）。这句话对今天的中美关系依然适用。

美国《时代周刊》著名撰稿人罗伯特·赖特在《非零和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一书中指出，人类命运的昌盛必然要懂得从“零和”年代走向“非零和”年代。“双输”观点是历史的逆流。



杨洁勉 (Yang Jiemian)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名誉院长

我同意大部分与会者的发言，即便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不会再次当选，时代也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正如艾德温·福尔纳说的，两国关系已经无法回到从前。美好的旧日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未来也并非一定是噩梦。

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需要了解彼此的心态、处事方式以及思维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人必须认真倾听美方，尤其在这个艰难时刻。希望我们的美国朋友也更多倾听中国人的心声。

让我们互相学习，知己知彼，向前看，这样末日场景才不会成为我们的未来。我们可以共同努力让明天更美好。



瓦利·纳斯尔 (Vali Nasr)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

就未来的全球秩序，以及美国外交政策向何处去而言，中国大概是最重要的国家。目前存在着两个理念。一个是美国人相信无论中国是不是 WTO 成员，或中国变得多么富裕，它都不会因为两国经济往来而发生改变；中国更有可能改变世界秩序，而不是被世界秩序改变。另一个是“修昔底得陷阱”，担心如果中国没有改变的话，我们终会走向对抗。

在这种语境下，美国可以指望的最好结果就是管控并遏制中国。事实上，奥巴马时期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像奥巴马的“重返亚洲”和 TPP 等。在这个意义上，虽然特朗普对贸易有独特想法，但他本质上其实是延续了奥巴马留下的“遏制中国”理念。这其实不是特朗普的问题。

在华盛顿及美国现政府内部，由于美国能阻止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时间不多了，问题已不仅仅是遏制了。这与霸权没有太大关系。其实，中国的经济崛起几乎无法阻挡，而美国必须做点什么来阻止它，以重申美国的单极地位；问题主要是在这里，而不是遏制中国。

我有听到某些总统顾问提到“1948 年时刻”，即美国必须以冷战及铁幕心态来

组织所有的外交政策。美国应如何往前走？这涉及很多领域。贸易是第一个，但它只是首当其冲。

还有科技，因为科技领域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即美国经济要保持领先于其他国家，如果输掉与中国的科技竞争，那就完了，基本上等于输掉了一切。

第三个领域是地缘，因为地缘是遏制政策和全球大国竞争最重要的部分。这很有可能是下一个竞争前沿。

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贸易，还要考虑科技和地缘。

除此之外，美中两国人们的情绪实际上也越来越对立，这也很关键。如果中国开始在美国被视为敌人，那也会影响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整体看法。

在乎中美关系的朋友们，尤其是美国和中国的商界，必须有所投入，以确保这一关系的正常。

总结



陈启宗 (Ronnie Chan)

恒隆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对中方的双赢概念感到很困惑。从逻辑上讲，它非常理性，非常正确。但我们说的不只是贸易，而是安全，安全有不同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呢？事实就是，它没有逻辑。这是完全不同的逻辑，安全问题上不存在双赢。

我建议我的中国朋友跳出我们的认知，跳出我们认为可能、合理及双赢的框架来思考问题。

美国人也许最终会意识到，目前对中国所做的一切于己不利。但美国人总是在用完所有选项后，才会做正确的事情。

对美国朋友，我想说，请思考，并说出你们真正的所思所想，这是我们发现真相的唯一途径。只有当发现真相时，我们才有机会拥有一个长期的更良好的关系。

议题三 全球化、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前景



吴作栋 (Goh Chok Tong)

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

吴作栋从新加坡的小国视角讲述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他将当前世界政治的升温比作气候变化，认为如果不加以遏制，当前的趋势有可能改变整个全球政治气候。

他在发言中表示，世界正处在十字路口，可能有两个前途，一个是走向灾难，另一个走向发展。而当前的两种全球性趋势，即去全球化和脱钩，有可能导致灾难而不是发展。

- 全球化使所有人受益，但如今世界也受到它的某些负面影响。负面影响之一是国家间收入的不平等，造成来自经济落后国家的合法或非法移民。而在国内，收入不平等也引发社会焦虑，如英国脱欧、美国的“美国优先”、法国“黄马甲”骚乱，以及欧洲议会选举中意大利和英国的右翼及民粹主义团体势力。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对“全球化抢走就业”的真正恐惧。

为应对反全球化趋势，吴作栋提出切合实际的建议：重组经济，并搞清楚究竟哪里在丧失工作岗位。最简便的措施是利用税收进行再分配；而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解决导致国内收入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教育、家庭支持和技能培训是必需的，为的是培养人们适应新经济，并让他们自立。

- 民粹主义政客指责说，是其他国家、外国投资、进口和移民造成了诸多国内问题，他们在利用这种对全球化的不满。吴作栋告诫，这种趋势，即从多边主义转向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从开放的全球经济转向有选择的保护主义，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真正问题。

吴作栋表示，“在争吵如何分配全球化的金蛋时，我们有可能杀死生金蛋的鹅”。他呼吁各方竭尽所能避免这一灾难性趋势。

吴作栋还提出从三方面建立中美战略信任的建议：

- 谈到威廉·欧文斯“为战争做准备”的说法，吴作栋表示：“我们必须为战争做准备，但我们不想要战争。”
- 谈到美国能否改变中国时，吴作栋表示中国应该利用这些压力，在可能的领域作出改变和改革。但改变中国政府体制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源于不同文化和制度的文明的政府形式。
- 关于民主，吴作栋表示每个国家都必须有自己的政府形式，都要遵循让各国自己最佳政府形式的客观标准（法治、待人方式、发展增长、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

吴作栋敦促要形成“缓和的声音”。那些了解中国和美国、了解双方冲突与挑战的人必须发声，并找到恰当的叙事方法，向美国当权者说明中国并不是敌人。他表示：

- 中国在短短 30 — 40 年内实现了自身的转型和发展，中国有什么理由成为所有人的威胁，让这一切毁掉？
- 如果中国就因为不断增长而被视为“经济威胁”，那么新加坡该如何自处？作为曾经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总结说：“一个繁荣的邻居比一个穷邻居好”，新加坡知道如何与一个富裕国家共处。

吴作栋最后表示，“缓和的声音”是为了防止走向灾难。人们必须发声，不必站在中国或美国一边，而要站在原则一边，这个原则就是法治和大小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多边贸易秩序。



博卡斯 (Max Baucus)

前美国驻华大使

博卡斯在演讲中谈了他和大多数美国人关心的几个问题。

首先，他认为中国或许已经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相应地改变规则有助于增加信任。基辛格博士多次谈到“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在增长，其经济将很快超过美国；中国也是军事大国。它将采取哪些行动来显示它想与西方合作呢？

习近平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会晤时提到这一点，但他表示陷阱是不存在的。不过说实话，人们并不知道是否存在陷阱。这取决于中国和美国能否更好地相处。这是人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而这个问题他们不能那么轻易回答。

博卡斯接着表示，另一个问题是吴作栋总理提到的战略信任。两个非常不同的国家，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如何相互信任？如何着手解决战略上的不信任？归根到底是要彼此真正尊重。

那么，如何获得尊重呢？必须显示更大的力量。美国怎样才能更强大？它需要通过发展重要的基本建设来加强自身。这也意味着美国人应该停止内斗，并开始与盟友合作。他们应该发展自己的 2025 规划。

与此同时，美国人必须尊重中国。这两个国家不同，体制不同。美国人必须尊重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对待中国人；不需要告诉中国该做什么，而是要告诉他们美国人能够和不能够忍受什么。

规则问题是美国的另一个重大关切。在博卡斯看来，中国几乎没有规则。但他同时表示，中国正致力于实现规则。两国必须采取一些规则，必须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找到达成这些规则的路径。双方还必须开始执行协议，而如果没有规则，执行就没有任何意义。

博卡斯表示，与中国人打交道时，他会恪守“三个P原则”，即：耐心、积极、坚持不懈（Patient, Positive, Persistent）。



让·克雷蒂安 (Jean Chretien)

加拿大前总理

让·克雷蒂安表示，中美关系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人们仍然强调的是问题，而不是成就。为此，人们需要回顾已经取得的进展。

克雷蒂安说，问题永远都存在，但人们需要了解真实的情况。比如在美国，失业率已经处在很长一段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赤字虽然是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要解决这些问题，克雷蒂安认为，人们不必有大学文凭，只需要一点常识，而且常识最终会占上风。因此人们有理由乐观。

克雷蒂安提出几点看法。第一，需要有一套被所有人尊重的规则。第二，财富激增掩盖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财富的再分配；这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巨大难题。最后，美国加征关税并声称中国将为此买单，事实并非如此，最后买单的将是美国消费者。



傅立民 (Chas Freeman)

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以下总结自傅立民发往会议现场的视频讲话。)

傅立民认为，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能拯救正在遭到特朗普政府破坏的体系。然而，美国突然陷入仇外心理和保护主义，这不仅威胁中国，而且危及整个世界，包括美国。

傅立民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像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一样，了解美中两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每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性。这是全球稳定、可预测、繁荣以及两国继续进步的先决条件。当前，这种合作已经变得不可能，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也不可能纠正这种情况。

傅立民指出，中国对这种崩解作出不情愿、克制和有限反应是明智的。但虽然克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伤害，但并不能抵消伤害，或者不能为最终出现逆转提供基础。

因此他认为，现在必须思考的战略问题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权宜之计和长期措施，来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所带来的好处，并使其最终回归正常？

傅立民认为，中国及其他国家必须超越今天的美国来寻求答案，并牢记以下几点：

- 首先要意识到，对中国国际贸易和投资行为不满的并不仅仅是美国。
- 对中国来说，一个可行的方法是扩大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绕过美国对全球治理的干扰，表明中国继续致力于改革开放，从而为全球贸易和投资流动的持续自由化奠定基础。
- 如果哪一天美国决定重新加入某些国际新架构，比如亚投行和“一带一路”，中国和这些架构的其他支持者要为美国留下大门、灯光和位置。WTO 及其他支撑基于规则秩序的机构，它们增进自身使命的任何努力亦应如此。
- 国际政治和经济的真实情况是，少数人反对解决问题，并不一定能够阻止很多人为了大家的利益而采取行动。
- 在作为中美关系基本文件的《上海公报》中，美中双方明智地搁置了意识形态分歧，使彼此能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并行工作。现在是恢复这种做法的时候了。这是当前扭转比如在台湾和南海等问题上走向战争趋势的关键。
- 最后，成功不仅需要各方对中美关系愿景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还要求双方就所追求的互利目标达成一致。

傅立民最后表示，没有战略基础的关系会让双方受制于各种事件，这就是中美关系的现状。世界各国必须积极捍卫全球化和多边治理体系，因为那是促进互利、非武力竞争、和平与繁荣的最佳途径。



小组讨论

过去 40 年，美国在中国建立了 7 万家公司，累计创造了 9000 亿美元收入。这种商业关系作为最持久的纽带，也许最终会使中美经贸关系不再恶化。这一小组的行业代表分享了他们的观点。



傅向升 (Fu Xiangsheng)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中美两国在石油天然气领域有着很强的互补空间。中国是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也是石油和天然气进口量全球第一的国家；而美国是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也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增量最快的国家。据美国的统计，2017 年中国是美国第二大原油出口地、第二大液化石油气出口地和第三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地。中美两国在石油天然气领域有着很强的互补空间，加大油气领域的合作是减少贸易逆差的最佳选择。

中美两国在化工新材料和高端化学品领域有很多合作机会。中国石化产业仍属于产业链的中低端，以基础化学品为主，高端产品仍以进口为主；中国又是制造业大国，对石化产品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尤其是高端工程塑料、高端聚烯烃、高端膜材料、特种纤维材料、专用化学品等的对外依存度更高。美国处于石化产业的高端，可以与中国基础化学品配套能力强的优势形成上下游互补的产业链，再与中国汽车轻量化及新能源汽车、风力及太阳能发电、轨道交通等巨大市场需求相结合，中美两国在化工领域的合作机会和前景无限。

中美两国石化界都期盼尽快达成平等互利的协议。在罗宾·古德曼先生主持的得州和奥斯丁市朋友们的对话中，重点介绍了得州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优势，特别是得州的液化天然气出口。中国液化天然气 2017 年进口量是 1337 万吨，从美国进口占了四分之一。我们在这次会上受到很多启发，有很多收获。



王宁 (Wang Ning)

中国电子商会会长

中美贸易摩擦当中 40% 涉及到电子产品，其中反映最强烈的是关于芯片，也就是集成电路这一块，中国每年进口的集成电路是占国家进口总额中最大的。

中国每年从美国及日本、韩国等一些国家采购约 3200 亿美元的芯片，输出的是终端产品如手机、电视等。

中美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是完全互补的，中国需要大量进口美国先进的芯片、软件，而美国低端的制造业大部分在中国。美国高端的产品获利比较高，中国终端产品比较低端而获利比较低，这是生产发展的规律。

中美贸易摩擦，如果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谈不拢，双方都会遭受损失。



许海东 (Xu Haidong)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兼贸易协调部主任

中美汽车行业一直合作良好，但未来也将面临经贸摩擦带来的问题。从今年 5 月份开始，原来 10% 的关税已经提到了 25%，这个费用是双方来承担的，最终一定会转嫁给相应的消费者。

美国大量的零部件企业已经在中国设厂和建立体系，在中国的销售额占其全球销售额的 15% 至 20%。中美汽车行业是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美汽车在技术转让方面完全是一种市场需求，而不是政府强制。比如通用，很早就把技术中心设在了中国，针对中国市场去开发适合中国消费者的车型，这种车型，在美国本土根本连设计和生产人工成本都做不到。比如特斯拉来中国投资，中国政府也并没有要求特斯拉转让相应的技术。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和消费的市场，已经连续 10 年世界第一。目前中国的千人保有量只有 172 台，一般发达国家约 500 台，美国是 800 多台。所以中国未来的市场非常大。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智能网联汽车的市场，中国都是全球最大的。

拥有巨大的市场、完备的供应链、勤劳的产业工人，中国未来会成为汽车制造的一个基地。



杨彬 (Brent Young)

英特尔副总裁

半导体产业联盟完全是一个全球性的产业，贸易便利化非常重要。

中国采取了一些非常积极的措施。根据一个有关贸易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调查，中国 2018 年的全球排名从前一年的 97 位上升到第 65 位，在全球范围提升了 1/3。这个进步是巨大的。

从法律透明度到规则和程序，中国还有很多可以改进。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在这方面采取更多的措施。

总结



王辉耀 (Wang Huiyao)

全球化智库主席

我们小组的讨论证明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基本面、企业界跨境的基本面是非常好的。我们听到了各个不同行业的观点，这应该是两国人民之间最重要的直接联系，这些基本面能最好地促进中美关系。

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

2019年7月9-10日
愉景湾，香港

会议第一天（7月9日，星期二）

09:00-10:30 开幕式

欢迎辞：

董建华（Tung Chee-hwa），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美交流基金会创办人、主席

主题演讲：

福田康夫（Yasuo Fukuda），日本前首相

艾德温·福尔纳（Edwin Feulner），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曾培炎（Zeng Peiyan），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国务院原副总理

10:30-10:50 茶歇

10:50-18:10 议题一：中美经贸关系

10:50-12:30 分组议题一：经贸关系现状

主题演讲：

威廉·戴利（William Daley），纽约梅隆银行副主席

张晓强（Zhang Xiaoqiang），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执行局主任

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中心高级研究员、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高级讲师

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Greenberg），C.V. 史带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小组讨论：

曹德荣（Cao Derong），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

马克·柯克 (Mark Kirk)，美国伊利诺伊州前参议员
刘遵义 (Lawrence Lau)，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高等金融研究院理事会主席
赵令欢 (John Zhao)，弘毅投资总裁
冯国经 (Victor Fung) (主持人)，冯氏集团主席

12: 30-13: 30 午餐

13: 30-15: 00 分组议题二：投资环境与技术创新

主题演讲：

马秀红 (Ma Xiuhong)，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会长
王杰 (Jeremie Waterman)，美国商会中国中心主任
王昌林 (Wang Changlin)，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小组讨论：

沈南鹏 (Neil Shen)，中国红杉资本创始人及合伙人
田力普 (Tian Lipu)，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理事长
郭涛 (Jerry Guo)，高通公司全球副总裁
周兵 (Zhou Bing)，戴尔科技集团全球副总裁
赵昌文 (Zhao Changwen)，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
魏建国 (Wei Jianguo) (主持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15: 00-15: 20 茶歇

15: 20-16: 30 分组议题三：宏观政策

主题演讲：

白莉娟 (Jan Berri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
朱光耀 (Zhu Guangyao)，中国原财政部副部长

小组讨论：

杜克雷 (Clayton Dube)，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主任
杰弗里·雷蒙 (Jeffery Lehman)，上海纽约大学首任副校长
傅育宁 (Fu Yuning)，华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尚希 (Liu Shangxi)，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南存辉 (Nan Cunhui)，正泰集团董事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陈文玲 (Chen Wenling) (主持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16: 30-18: 10 分组议题四：得克萨斯州和美国中部地区代表谈“合作”

主题演讲：

方大为 (David Firestein)，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
鲍勃·霍顿 (Bob Holden)，美国中部地区美中协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杰夫·莫斯利 (Jeff Moseley)，得克萨斯州商业联盟首席执行官
吉米·弗兰尼根 (Jimmy Flannigan)，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议员

小组讨论：

徐莉 (Li Xu)，M&A 国际创始人
威尔·尼科斯 (Will Nichols)，Core Engineering 项目工程师
玛丽娜·巴加瓦 (Marina Bhargava)，大奥斯汀亚洲商会首席执行官
安德鲁·卡兰科 (Andrew Carranco)，拉雷多商会董事
方大为 (David Firestein)，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
罗宾·古德曼 (Robbin Goodman) (主持人)，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
商业项目和企业事务主任

18: 10 第一天休会

会议第二天 (7月10日，星期三)

08: 30-10: 20 议题二：中美关系：现在与未来

主题演讲：

尼尔·布什 (Neil Bush)，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创始人及董事会主席
威廉·欧文斯 (William Owens)，Red Bison 咨询集团执行主席、
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
董建华 (Tung Chee-hwa)，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美交流基金会创办人、主席
周文重 (Zhou Wenzhong)，中国-美国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博鳌亚洲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

小组讨论:

艾江山 (Karl Eikenberry), 斯坦福大学美国 - 亚洲安全倡议项目主任
大卫·兰普顿 (David Lampton), 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奥克森伯格 - 勒伦学者
戚振宏 (Qi Zhenhong),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杨洁勉 (Yang Jiemian),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名誉院长
瓦利·纳斯尔 (Vali Nasr),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
陈启宗 (Ronnie Chan) (主持人), 恒隆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

10: 20-10: 40 茶歇

10: 40-12: 20 议题三: 全球化、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前景

主题演讲:

吴作栋 (Goh Chok Tong), 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
博卡斯 (Max Baucus), 前美国驻华大使
让·克雷蒂安 (Jean Chretien), 加拿大前总理
傅立民 (Chas Freeman), 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小组讨论:

傅向升 (Fu Xiangsheng),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王宁 (Wang Ning), 中国电子商会会长
许海东 (Xu Haidong),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兼贸易协调部主任
杨彬 (Brent Young), 英特尔副总裁
王辉耀 (Wang Huiyao) (主持人), 全球化智库主席

12: 20 论坛休会

